



Comparative
Politics Studies No.1

比较政治学研究

主编 李路曲

主办 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

李路曲 比较政治分析的逻辑

佟德志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贡献——兼驳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法学空区”论

齐卫平 当代中国政治体制的模式特征论析

黄卫平 郑超 经济特区的政治逻辑——献给深圳经济特区30周年

储建国 仁护民主——中国的民主传统及其当代意义

〔英〕克特·理查德·路德 〔德〕费迪南德·穆勒-罗密尔 变革欧洲中的政党

〔美〕克里斯托弗·蔡斯-邓恩 全球化：一种世界体系的视角

第1辑



全国百佳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Comparative
Politics Studies No.1

比较政治学研究

主编 李路曲
主办 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

第**1**辑



全国百佳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比较政治学研究. 第1辑/李路曲主编.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11

ISBN 978-7-5117-0609-6

I. ①比…

II. ①李…

III. ①比较政治学

IV. ①D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08422号

比较政治学研究. 第1辑

出版人 和龔

策划编辑 贾宇琰

责任编辑 侯天保

责任印制 尹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36号(100032)

电话 (010)66509360(总编室) (010)66509367(编辑室)
(010)66509364(发行部) (010)66509618(读者服务部)
(010)66161011(团购部) (010)66130345(网络销售)

网址 www.cctpbook.com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河北下花园光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787毫米×960毫米 1/16

字数 262千字

印张 18.5

版次 2010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价 58.00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首席顾问律师 鲁哈达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66509618

序言

Foreword

比较政治理论、比较政治制度、国别政治、地区政治均为《比较政治学研究》辑刊的关注研究领域。《比较政治学研究》辑刊的策划与出版是在华东政法大学支持下，以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为依托，致力于解读纷繁的国际政治现实，在对比研究中提炼共通性的分析工具，以期提供可为国家政治发展以参照的最优尺度。

华东政法大学（原“华东政法学院”）是新中国创办的第一批高等政法院校。1952年，原圣约翰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东吴大学、厦门大学等9所院校的法律系、政治系和社会系合并组建成立华东政法学院。而后因历史原因，学校曾两度停办。1979年，华东政法学院第二次复校。2000年，在新一轮院校布局调整中，华东政法学院由隶属司法部改为“中央与地方共建，以地方管理为主”的上海市市属普通高等院校。2007年3月，经教育部批准，华东政法学院更名为华东政法大学。

相对于国内历史悠久的知名综合性高等学府，华东政法大学是一所尚属年轻的大学。华东政法大学未来发展的目标是建设多科性大学，振兴包括政治学在内的多个优势学科。政治学是当前华东政法大学非法学科发展的重点之一，具有取得显著突破的潜质，其原因有三：

第一，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学科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圣约翰大学时期。地处万航渡路的华东政法大学于圣约翰大学旧址上办学。圣约翰

大学是中国教会大学中历史最久的学校之一，被誉为“东方的哈佛”、“外交人才的养成所”^①，其政治学学科是在国内设立较早且较完整的。1918年，圣约翰大学在文学院下设政治学系，其下设课程为政治学、政治学理论、国际法、法律学、国政比例学、法学理论之历史、万国公法择要、外交实行、东方外交学。^②在1934年圣约翰大学的文科课程设置中，政治学共设有政治学纲要、法学纲要、国际公法、市政、中国市政、英法政府、欧洲大陆之政府、中国之国际关系（1895年止）、中国之国际关系（1895年后）、宪法研究与民国制宪史、中国政府、财政学、国际组织、政治理论史和专修课程等，共15门，列文科21个学科课程总数之首（当时文科课程总数为126门）。^③圣约翰大学为近代中国培养了邹韬奋、顾维钧、施肇基、荣毅仁、李慎之、陈鲁直等一批杰出的外交家和政治家。岁月流转，我们相信华东政法大学新一代政治学学者在这些先辈们学习过的殿堂里薪火传承，复兴华东政法大学具有中国乃至国际影响力的政治学学科。

第二，华东政法大学内法学与政治学学科间相互给养。华东政法大学传统优势学科是法学学科。在社会科学各学科中，与法学最为接近的是政治学。政治学和法学同处于大法学的学科范围之下，具体到子学科，我们可以看到政治学理论与宪法学、行政学与行政法学、政治哲学与法理学、国际关系学与国际法学、比较政治学与比较法学之间的相互融通之处。法学和政治学学科邻近有两点蕴意：其一，政治学的演进可以借助法学之力，优势互补。其二，政治学学科的完善会为法学等相关学科进一步拓展提供更为坚实的学科结构支持。

第三，华东政法大学的政治学在新时代下构建起卓越的学科平台。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学科的发展已经颇具规模，它是上海市首批教育高地之一。政治学学科是校级重点学科。2008年1月，学校组建了政治学

① 张仲礼：“序”，见熊月之、周武主编：《圣约翰大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② 熊月之、周武主编：《圣约翰大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45、198页。

③ 同上书，第148、153页。

研究院，其目的正是希望整合政治学学科的人才资源，提升政治学学科的科研水平，推动政治学学科的整体发展。近年来，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正以比较政治学为主导研究方向，锐意进取、开拓创新。希望《比较政治学研究》辑刊的创办可以使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和其他高校、研究机构的比较政治学优秀研究成果定期得以传播和发扬。

华东政法大学极为重视本校政治学学科的发展。从字面上来看，就“华东政法大学”中“政法”二字所揭示的内涵限定而言，尽管学校在法学方面已经取得了不少成绩，然而我们还需要推进和加强政治学方面的建设。《比较政治学研究》辑刊的创立是把“华东政法大学”的“政”字内涵做实的关键一步。《比较政治学研究》辑刊将为政治学研究者提供公开的学术交流与争鸣之园地，诚邀相关议题学者共同探讨比较政治学，以促进学科繁荣和进步。各国各地的学者对《比较政治学研究》辑刊的支持和参与是对比较政治学学科的贡献，同时也是推动我们前行不竭的动力。

谨此为序，并与学界同仁共勉。

何勤华

于华东政法大学

2010年4月22日

目录 / Contents

序 言	何勤华/1
-----------	-------

【理论研究】

比较政治分析的逻辑	李路曲/1
时空视野中的政府权力	常士闾/18
社会权利的历史分形与当代整合	郭忠华/40
比较视野中的自主国家与宪政国家	袁 峰/59

【方法研究】

比较政治理论建构的一般途径	邢瑞磊/77
---------------------	--------

【案例研究】

30 年中日公民社会成长与政治发展 ——一种比较政治的分析	高奇琦/97
中西比较视阈下电子民主发展的现实性介入	阙天舒/112

【比较视野下的中国政治】

中国共产党与西方政党执政合法性资源比较	阮黄南/125
---------------------------	---------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贡献

——兼驳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法学空区”论 佟德志/141

当代中国政治体制的模式特征论析 齐卫平/151

经济特区的政治逻辑

——献给深圳经济特区 30 周年 黄卫平 郑 超/163

我国政府职能转变问题的反思 何 颖/179

仁护民主

——中国的民主传统及其当代意义 储建国/189

从维权抗争到协商对话

——当代中国民主建设的新思路 张紧跟/213

【比较视野下的地区和国别政治】

变革欧洲中的政党

..... [英]克特·理查德·路德 [德]费迪南德·穆勒-罗密尔/231

南斯拉夫地区宗教冲突的国际政治理论逻辑比较 章 远/245

【全球议题】

全球化:一种世界体系的视角 [美]克里斯托弗·蔡斯-邓恩/258

比较政治分析的逻辑

李路曲*

【内容摘要】 与非比较政治分析的基本逻辑是直接探讨政治现象间的因果联系有所不同，比较政治分析的基本逻辑是在复杂而多重的关系中探索政治现象之间的关系，使那些在非比较研究中无法排除或认为由于相互抵消而不起实际作用的变化成为解释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其操作逻辑是指贯串于具体而直接的运用和操作的方法之间的逻辑关系，这表现在从个案方法、集中比较、真伪对照分析到统计分析有着一脉相承和相互补充的逻辑关系，由此既可以满足人们对政治现象或个案进行深入而全面的研究和理解，也可以满足人们对大量的相关变项进行量化分析，由此体现着比较分析的系统性。

【关键词】 比较政治分析；基本逻辑；因果关系；归纳；操作逻辑

一、政治分析的基本逻辑：非比较性的

政治分析就是探索政治现象间的因果关系，从其最核心的意义或特

* 李路曲：博士，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点上来说,它并不是比较性的,或者说直接进行单一因果关系分析的方法通常不被看做是比较性的。例如,如果一个农民参加了村长的选举,而其动因就是因为候选人是自己的亲戚。如果仅就这一因果关系进行调查,那么这很难说是比较性的。进一步来说,政治学中一些试图对社会和政治现象作出解释的方法并不是比较性的,而主要是使用自己建立的概念或范畴寻找政治现象间的联系。例如,在研究英国的选举情况时发现处于社会底层的印度移民有投票给工党的行为趋向,就可以根据这个案例进行演绎,把它解释为受到压迫的少数民族或一个民族处于社会底层的成员倾向于把票投给左翼政党。这就成了一般性的命题,即少数受压迫者倾向于把票投给左翼政党。要应用这个命题或理论,就要从这个一般性命题的逻辑中寻找相关的个案,即这一理论为预测其他个案提供了分析的基础。例如,基于这个命题的普遍性和现实性,可以逻辑地推断美国的拉美裔和黑人中的下层阶级倾向于投票给民主党。这是按照因果律来推导的命题,它从直接观察的现象中推导出结论,推理表现为“受压迫的少数人”中存在着“投票给左翼政党”的行为倾向。^①这两种变项关系中都带有此种因果关系的属性,前者的属性促成了后者的属性。用这种方法,人们就可以在建构假设和理论时,从直接观察所得出的有限因素里推导出既定环境中无限的后果。这种方法和逻辑之所以不是比较的,不但是因为从印度移民投票给工党的行为中推导出“社会底层成员有投票给左翼政党的倾向”这一假设是从单一因果关系或变项间关系中分析推导出来的,而且它在应用这一假设时也没有进行多个案例的验证。

另外一种情况是,有些学者把比较政治分析的方法界定的很宽泛,在非常广泛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方法,在他们看来,个体研究或个案研究无不是比较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尽管在很多情况下确实如此,尤其是半个多世纪以来比较政治学的视野和研究范围的扩大以及全球化趋势使

^① [美] 劳伦斯·迈耶、约翰·伯内特、苏珊·奥格登:《比较政治学——变化世界中的国家和理论(第2版)》,罗飞、张丽梅、胡永浩、冯涛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孤立的研究越来越少了，但这仍然有所偏颇。一些专门从事比较政治学方法和理论研究的学者不同意这种观点，他们是在较严格的意义上来表述这一方法，从而把宽泛意义上的“比较”排除在了比较政治分析的方法之外。这样，狭义的个体研究或国别研究就不被看成是比较政治分析的一部分，而这在传统的政治研究中是常见的情况。

理论是否经得起实践的检验或解释功效的强弱，是衡量其科学性的重要标准，也是它与错误的或者不是以因果律为核心的方法相区别的标准。进而，一种理论是否具有科学性和普遍性是可以检验的，因为它要为人们所接受，只有在从它的逻辑中推导出的假设或普遍性与现实情况相一致时才有可能，否则就缺乏适用性和科学性。例如，《圣经》中对创世纪的描述，以及对最终真相的任何判断，不能从中逻辑地推导出任何对于未来事实的预测，因而不具有普遍性；进而，这样的方法既不会被伪造，也不会被证明是错误的。^①当然，严格说来我们从来也不能证明一个假设或理论是完全正确的，因为科学理论的指向是无尽的未来，而我们不可能找到所有相关的证据。如果说在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的某些领域中“正确的理论”存在着相对完整性的话，那么在政治科学中这种相对完整性要小的多。例如，对重要的社会革命或社会改革动因的探讨是相对的，不仅某一特定国家的动因充满着复杂性，我们很难穷尽与其相关的各种因素或变项的影响，而且对不同国家的探讨会因为各自环境的不同而更加难以检测。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设立某种标准，通过从某种理论中可以证明或不可以逻辑地导出某种现象来对相关假设或理论进行论证和检验。

由此看来，任何关于政治现象非比较性的因果关系的研究，只能分析出它们之间的一些主要的因果关系，并且一定要认定所有其他相关而未被分析的因素的作用会相互抵消，否则就不能认定那些原因是主要原因。而这在很多情况下并不能真实的反映现实政治世界的情况，因为政

^① [美] 劳伦斯·迈耶、约翰·伯内特、苏珊·奥格登：《比较政治学——变化世界中的国家和理论（第2版）》，罗飞、张丽梅、胡永浩、冯涛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

治现象或因果关系间的联系很少是单一的或简单的，而是复杂的。因此，一般政治分析所能提供的对复杂政治现象的解释总是不完整的，而从这样的解释中所产生的结论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或然性的”，这也意味着它假设的是在一定环境中可能而不是必然发生的事情。这种理论解释的基本逻辑仍然与传统模式中的逻辑一样，是从一般的假设来对事物进行推理和预测性解释，这就使它在预测的准确性和解释的完整性上有一定的局限性。而这正是比较政治分析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的问题，尽管它也不能完全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最终看到，一般的政治分析与比较政治分析没有本质的区别，其基本逻辑是一致的，只是在解决复杂问题的范围和程度上有一定的差别，比较政治分析的基本逻辑的特点是它的多重性和比较性。

比较政治分析的起点和作用，是当受到非直接的或多重自变项的影响而难以导出因果关系时，或者说出现未被分析的变项的影响以及“伪相关因素”的影响而使某些个案与理论推导出的假设或规则不相符合时，就需要我们从这些特殊的个案中进一步去寻找相关变项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新的因果关系，这就是比较政治分析所要达到的目的或任务。举例来说，在受教育程度与政治态度之间有一定的关联，一般来说，受教育程度越高，宽容度也越高。但是有些人却与此相反，尽管他们受教育程度很高，却不能容忍任何异议。原因可能有多种，其中宗教信仰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也就是说由于对某一宗教信仰会使某些受教育程度很高的人不能容忍异议的存在。由此看来，只有在非宗教影响的情况下高教育程度才能产生宽容。^① 这样，通过对宗教因素的分析，我们会使对这一命题的解释变得更为丰满和准确。这里的教育程度与宽容是一对直接的因果关系，而宗教因素是研究过程中发现的另一相关因素，实际也成了另一个自变项，比较分析则是把它的影响纳入研究过程进行分析的有效方法。这就是说，要检验和发展这个命题或理论的

① [美] 劳伦斯·迈耶、约翰·伯内特、苏珊·奥格登：《比较政治学——变化世界中的国家和理论（第2版）》，罗飞、张丽梅、胡永浩、冯涛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

正确与否或适用程度，要在现实世界中寻找相关的案例来进行检测，这本身就是比较性的了。

二、比较政治分析的逻辑

比较分析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一种基本方法，因为在多数情况下社会现象都不能仅靠单一分析而是要通过综合分析各种因素来取得正确的结论。^① 如果要对一些社会在现代化飞速发展和社会转型时期暴力事件的增多这一政治现象进行解释，就不仅要对这些事件中每个参与者的行为进行分析，还要对这些社会的社会环境甚至历史传统等相关因素的影响作出解释，而这只能通过比较政治分析来寻找结论。因此，比较研究的特点或合理性是分析和评估各种变项间的关系或解释，以从中得出合理的结论。我们大致可以用三种不同但最终相关的路径和目标来表述比较政治分析的这一过程：一是为寻找因果关系而系统地考察各相关变项中发生的相似变化，例如亨廷顿对 20 世纪后期数十个发展中国家政治转型的研究就是如此，通过比较而找到了发生这类政治转型的普遍原因和各国的特殊原因。^② 二是以某一特定的理论或概念来解释某些现象间的因果关系，并为检验某些理论或概念来考察一定数量的案例。这种比较方法可以通过在不同的案例中解释变项间的因果关系或理论的适用性而完善和发展理论，至少也可以扩展理论的适用范围。例如，马克思的社会革命理论是从研究社会发展规律和欧洲 19 世纪的革命中总结出来的，我们可以这种理论为指导研究后来的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以及其他国家的革命。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这一理论可以使我们深刻认识和解

① 有些学者坚持比较政治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几乎所有的政治分析都可以包括在比较分析之内，例如马克·I. 利希巴赫等，可参见〔美〕马克·I. 利希巴赫、阿兰·S. 朱克曼：《比较政治：理性、文化和结构》，储建国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5 页。

② 〔美〕塞缪尔·P. 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张岱云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9 年版；《第三波——20 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三联书店 1998 年版。

释各国革命的原因、过程和性质，包括导致革命爆发的相关经济和社会矛盾以及阶级关系等；另一方面通过增加对这些重大案例的考察和研究可以进一步检验马克思的社会革命理论以及欧洲的革命经验，找到它与后发展国家革命的联结点，并根据本国的情况扩展或减少它的某些适用性，进而发展和丰富这种理论。三是为了弄清相关发展中的相似性和差异性，以及从中找出政治现象间的联系，通常至少要考察两个案例，尤其是需要建立一个合理的比较框架，以解释政治现象在相关变化过程中是如何在各自的背景中以不同的或相似的方式发展的，或者说由于受到相同或不同因素的影响而相似或有所不同的。^① 例如，我们要弄清中国和新加坡政治发展中的相似性和差异性，甚至要弄清其中一国的特点，都要对这两个案例进行考察，而不能只考察其中的一个，同时建构什么样的分析框架或以什么方式和如何进行考察也是重要的，它决定着考察的质量和结果。^②

从以上看来，比较政治分析的基本逻辑就在于通过在复杂而多重的关系中探索政治现象之间的关系，使那些在非比较研究中无法排除或认为由于相互抵消而不起实际作用的变化成为解释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无论是系统地考察各种变项的影响、应用相关的理论范式进行分析或通过案例来进行检验还是建立相似性或差异性的比较框架，都在于它是通过处理复杂关系或建立比较框架来分析政治现象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比较政治分析不仅是一种对现实问题进行分析的方法，还是一种对理论或概念进行建构的方法，其中所包含的归纳逻辑可以对处于不同国家或文化背景中的同类现象进行归纳，使解释和概念具有普遍性。

当我们在研究中发现了原以为既不是自变项也不是因变项或处于某一因果关系链条之外的相关变项时，就可以通过比较分析来确定或排除它的影响。由于比较政治是将政治或社会系统作为整体来进行分析和归

① Skocpol, Theda, and Margaret Somers, "The Uses of Comparative History in Macrosocial Inquiry",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 22, 1980, pp. 147-197.

② 可参见李路曲：《我国与新加坡政治发展模式的比较》，载《理论探索》，2008年第4期，第117—121页。

纳，所以它可以顾及到政治现象发生前后各种情境因素的作用和横向的相关性，这包括一个国家的历史经验、地理环境、经济社会结构和文化等。这些因素对具体的变项、变化或体制都可能产生重要的影响，例如不同的经历或所受的任何特定的刺激或挑战都会对人的态度和行为产生影响，致使在不同的国家和处于不同的时期人民对权力有着不同的态度。而比较政治分析就是通过对这种态度或政治现象发生时的情境因素所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和归纳，从而解释这种态度的特殊性和普遍性。

迈耶等以某些国家的性别、宗教和政治倾向为变项，通过阐述它们之间的变化关系来阐明比较政治分析的作用。他们指出，由于原教旨主义礼仪的复苏，某国的妇女近年来倾向于更为信奉宗教，由此可以得出“妇女比男性更为保守”的结论。这样的因果关系模型是：性别→宗教信仰→政治倾向，这也是直接进行政治分析的结果。但是研究发现，这种因果关系在一些国家里存在，在另一些国家里则不存在。例如，英国在宗教信仰上就不存在性别上的差异，自然也就没有由性别差异而导致的政治倾向上的差异。但是我们既不能由此推断在其他国家不存在这种因果关系，也不能由此推论英国是一个例外，得出除英国以外的所有国家的妇女都比男性更为保守的推论，因为作为一个专有名词的英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实体，它既不能完全代表其他国家的情况，也不能说明其他国家与它的情况不同。然而理论是要对各种个案作出解释，使我们能从直接观察中提出假设或结论，从而不再局限于对事物的描述。因此，在这个案例中，我们要进一步研究哪些是导致英国被排除在解释性规则或理论之外的因素，或者归纳出哪些是英国的特殊因素或变项，这些特殊因素或变项导致了它不受“妇女比男性更保守”这一普遍性命题的支配，并可能从这种特殊性中推导出另一个一般性的命题，例如推导出在高度世俗化的国家中男性和女性的开放或保守性是相等的或其他什么结论，这就是比较研究所要做的工作。由此看来，上面的因果关系模型似乎只适用于那些宗教信仰程度较高的国家，而不适用于高度世俗化的国家。用普齐沃斯基和托伊恩的话说，就是必须将政治体制的某些专有特性转换成普遍性，在我们的例子里，就是将“英国”这个概念转换为

“高度世俗化国家”这个概念。^① 这是揭示比较方法精髓的一种方式。

这种情况告诉我们,如果一个假设在某些情境中适用而在另一些情境中并不适用,那么用比较方法来进行进一步的分析是有效的。对多种案例和变项进行比较,能使我们推导出不同情境影响变项的各种因素和规则。同时,如果不在跨国家和跨文化的广度上进行比较分析和归纳,我们就不能发现更多的情境因素是否在归纳过程中起作用,不能确定某个假设是否在特定的情境中真实和适用。由此看来,政治分析最终不可避免地要成为比较性的,而比较分析在本质上与建构政治解释和理论的政治分析也没有什么不同。

尽管比较政治研究主要是以国家为单位进行的,但这并不妨碍在一国范围内的时序和空间上使用比较方法,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对本国的情况有更深刻和更全面的理解,因而也就更容易进行比较。这种比较可以是对一个国家不同时段上的情况进行比较,也可以是对一个国家内不同地区和制度的情况进行比较,这与跨国比较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在这个意义上,比较方法的应用不在于是从事一国研究还是多国或世界范围的研究,而要看它是否真正是比较性的。但如果缺乏广泛的跨国比较,其比较研究的结论则很难具有科学性和适用性。

任何政治现象都具有独特性和复杂性,然而这并不能否定它们之间也存在着相似性,因而也就不能否定对它们进行归纳的可能性和价值。事实上,通过归纳寻找相似性的比较过程是建立在假定被比较的对象在大多数方面都是不同的基础上进行的,这个过程实际是在“不同的”事物中去发现某些“相同的”方面,而对于完全相同或同一现象是没有必要去进行归纳并寻找其相似性的。例如,对英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发生原因的比较,是在承认英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本身是两个相互独立或不同的政治现象的基础上去探求导致它们爆发的共同的和不同的因素或变项,结果发现了资产阶级的发展是革命的主要推动力这一共同的自变

^① [美] 劳伦斯·迈耶、约翰·伯内特、苏珊·奥格登:《比较政治学——变化世界中的国家和理论(第2版)》,罗飞、张丽梅、胡永浩、冯涛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7—8页。

项。尽管两国的资产阶级本身也还有诸多的不同，但那多是引发其他相关变化的变项。

由此看来，比较政治分析的逻辑是“间接”的而不是“直接”的，是“群体性”的而不是“单一性”的，它不是直接或单一性地去探寻政治现象的因果关系，而是通过分析政治现象间的多重关系和变项来探寻它们之间内在的因果关系。实际上，由于政治现象间的关系大多是复杂的，只能通过这种对“群体”或多重因素的“间接”或综合分析归纳才能得出较为客观的结论。例如，尽管统计方法一度成为比较方法中具有支配性趋势的一种方法，但其研究单位的变项或单一化倾向与我们所讲的典型意义上的比较研究单位的多重性和群体化倾向有明显的差异，这导致了统计分析的结果可能是准确的，但它的效用和结果并不可靠，它没有从根本上解释或解决问题。例如，由对一些国家的社会调查和统计数据所建立的回归线说明了不同年龄、群体以及时代与政治价值观的关系，但这并不能完全说明其中的某个国家之所以处于或偏离这条回归线上的位置的所有甚至某些重要的原因，而这只能通过对更多的相关因素进行多维度而充分的比较分析才能阐明。有的学者是把这种情况看成是这两种方法对潜在的和伪相关因素或变项的控制能力的不同，他们指出，任何一个政治和社会现象或变项都可能受到多种因素或变化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统计方法很难辨别其中真正发挥影响力的变项，或把所有有影响力的变项都挖掘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对复杂的政治现象就难以作出有力的解释。而比较政治所要研究和解释的问题也就是关键之处在于要确定哪些相关性在经验上和理论上真正有价值，从而找到真正的因果关系；或者哪些没有价值和不具有真正的相关性。这既是它的价值所在也是困难所在，尽管在理论上它也很难能完全做到这一点，但至少可以在更大程度上做到。简言之，鉴于社会现象和变化的诸多外部影响之间相互作用的复杂性，比较政治研究的一个完整的过程或任务不仅是要在比较框架中从对政治现象的分析和归纳中提出假设和理论，还要在比较框架中辨明或论证它所提出的假设或因果关系是否具有普世性。